

2110

资中县文史资料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第八辑

政协资中县委员会 编
资中县修志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



目 录

史志资料

- 资中县历代名人选介.....周叔平
- 杨禹昌烈士英勇就义时概况.....刘凡德
- 清状元骆成驥所撰的四副对联.....周嗣荣
- 资中木偶戏.....王志行
- 资中县发现的宋代铁币窖藏.....胡清友
- 资中县佛教概况.....释清德
- 资中县水利电力建设之“最”(一).....李 丹

资中风物志

- 宁国寺.....王志行
- 明心古刹话今昔.....刘盛之、游泽麟、胡孝元

500 / 1502

豹岭乡猫猫岭概况.....张钦明
 归德乡芦高山.....吴贤桃
 资中县龙结场（镇）概况.....蔡德丰 潘健脩 王光大
 书法家陈拔寅简介.....蔡德丰 潘健脩 王光大

资中 风 土

坚持殡葬改革方向，积极推行火葬

——资中县火葬事业的兴起.....资中县民政局、殡管所、火葬场
 资中訛音初探.....叶博夫
 资中名小食（续）.....王志康
 兔毛.....资中县外贸站编志组

编 者

（此处为大量模糊不清的印刷文字，疑似为正文或附录内容，因清晰度低无法准确转录。）

资中历代名人选介

周叔平

善和成的王承宗

王承宗，蜀汉时资中人。举孝廉后，任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感顺者众，素桀者亦皆来首降。承宗待以恩信，西北境内，得以宁静。

大将军姜维出师北征，羌胡出马牛羊及义谷以资军用。承宗亦以功迁镇军，故领郡。后从姜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日卒。

羌胡闻承宗死，会葬者数千人，号呼涕泣不已。承宗为人诚厚，为众所信，其子及孙，羌胡见之亲如骨肉，或结为兄弟。

敢言的邓继曾

邓继曾，明武宗正德进士。任兵科给事，疏陈杜渐保终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蛊惑之渐；二、均两官之孝养，以杜嫌隙之渐；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渐；四、请传奏，以杜假托之渐。

世宗后疏大臣，政由内决，继曾抗章曰：“悦邪说之谄媚，则赐教褒俞；恶师保之抗言，则渐将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诵吞声。左右群小，目不知书，身未经事，乘隙招权，弄笔取宠，故出言无稽，一至于此。陛下不与大臣共政，而倚信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

疏入，帝震怒，下诏鞫掠治。滴金坛县丞。继曾得罪后，帝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

反抗权奸的周冕

周冕，明世宗嘉靖时进士。授太常博士，擢贵州道试御史。是时太子十一岁矣，犹未出阁讲学。冕极言教谕不可缓。帝又怒，滴云南通海县典史。

冕虽远窜，意慷慨无所屈。数迁至武选郎中，劾奸相严世蕃假名之子严效忠冒功事，理由是：一、世蕃三子皆幼，并无十六岁之子，况三幼子中无名严效忠的；二、在云南斩首七级立边功的，乃十六岁少年的号称宰相之子，其他诸将无一斩首者，其虚假明矣；三、历史上哪有宰相以十六岁少年之子赴大敌，而且勇冠三军，斩首七级。又诬言严鹤是严效忠弟，效忠现有痼疾，其官位应由鹤代，“臣悉心廉访，初未有名效忠者赴军门听用。鹤亦非效忠亲弟，其姓名乃诡设，首级亦非有纤毫实迹也。……臣如不言，陛下何由知其奸……臣职守攸关，义不敢隐，乞特赐究正，使天下晓然，知朝廷有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虽得罪，死无可恨。”疏奏，直声震朝廷。严嵩、严世蕃父子大惧，力事弥缝。帝责冕报复、下

EC39/3502
诏狱掠讯，斥为民。

隆庆初，录先朝直臣，起冕为太仆少卿，遭母忧，未任卒。

精明能干的何昭然

何昭然，清同治三年中四川乡试第二名举人。光绪十五年，适广东八排猪匪与民交攻，两广总督张之洞以昭然果毅有为，晓畅兵事，奏调由桂赴粤督办，事竣后，八排猪直至清末不再滋事。

光绪二十六年督办上游河工，竭力整顿、工坚费省。尤注意于“民埝”、“金堤”，即以所省岁修余款，加工培护，僚友多嗤之。殊“民埝”于二十七年夏秋伏汛，多所保全。“金堤”则于二十八、九两年、临黄堤漫溃、幸得此保障河北、山东两省数十州县、生民得免其鱼，僚友始钦其远见。

光绪三十三年，直隶（河北）总督杨士骧奏陈热河围场地严寒，人情强悍，盗木匪徒及马贼，出没无常。

昭然开办围场之初，艰难万状，联络营队，认真防范，督帅员司，没法经营，伐木招垦，数年间，租项递加、统计岁收银至十六、七万两。其苦心筹画，实为人所难能。

昭然在“围场”首尾八年，方其初至，四望荒凉。为之画界分疆。营造市宇，招徕农民，给以耒耜、牛种，由是污莱尽辟，商务繁兴，聚处者几数万家。兽蹄鸟趾之地，一变而为衣冠文物之乡，自昭然始。

昭然通籍垂五十年，在广西尤久，培养士类，不遗余力。公余亲为改削文艺，当时桂士最著名者，咸出其门。

至于行己则孝友清勤，接物则温恭信惠。家无余财，性嗜书，购藏者数万卷，终日研读不已。乡里妇孺、知与不知、咸称为何青天云。乙卯秋卒，年七十三。

杨禹昌烈士英勇就义时概况

刘凡德

下面写的杨禹昌烈士英勇就义的概况，是四十年前我在资中县立男中校读初中时，同班同学李光佐告诉我的。由于对烈士的崇拜，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李光佐说：“杨禹昌为了革命，和另外两个革命勇士一道，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一个酒楼上潜伏着。当袁世凯在楼下经过时，他们使用手榴弹炸袁世凯，不幸未中，三人当即被捕。审讯时，袁的刽子手把杨禹昌吊起来用皮鞭狠命抽打。杨禹昌周身被打得皮开肉绽。这时敌人问他：‘现在怎么样？招不招？’杨禹昌坚定地回答说：‘肉痛心不痛，你能把我怎么样！’敌人无可奈何，便采取更残酷的手段，用装着烧红了的柄炭的煤油桶，系上铁丝，将铁丝挂在杨禹昌的颈上，铁桶背在杨禹昌的背上。杨禹昌的背被烧得血、油直往下流，不少地方还被烧焦了。一会儿，杨禹昌昏了过去，刽子手对他填心一刀，杨禹昌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

清状元骆成骧所撰的四副对联

周嗣荣

清状元骆成骧，资中舒家桥钵头乡七里沟人。我们两家相距很近，是老亲。从我的幺公周之镐（骆成骧的五外弟，叔平三叔之父，曾任资州中学堂校长、资州劝学所所长——相当于现在的文教局长）口中，我还记得骆成骧所撰的如下的四副对联。

一 自励

再穷无非讨口，
不死总要出头！

骆家素贫困。骆成骧青少年时发愤攻读，立志成才。这副对联就反映了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拼搏精神。

二 登广武山观楚汉战场

拔山盖世之雄，千呼不转；
金戈铁马之地，百战还来。

这副对联是骆成骧中元后，在返蜀途中，经河南广武山，观楚汉战场而作。联语气势雄浑，反映了他抚今追昔的情怀。

三 讽袁世凯

天生慕容绍宗，专为侯景；
可怜公子无忌，不死蒙骜！

骆成骧是反对袁世凯的，从他为川督陈宦所拟的致袁三电稿可知。袁窃国致败，呕血而死，骆又撰此联讽之。上联以慕容绍宗比喻蔡锷，以侯景比喻袁世凯：慕容绍宗讨贼，使侯景败亡；蔡锷起义，使袁贼覆灭。下联又以公子无忌（信陵君）比喻袁世凯。魏无忌如果与秦将蒙骜作战而死，便不会有日后以酒色自戕之事；袁世凯如果在窃国之前死去，就不至有身败名裂的下场。

四 题西湖湖心亭（注）

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
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联语对仗工稳，意境清新，把湖心亭的胜景和置身其中的乐趣描绘得很明朗、很轻快。

（注）此联后来刊入了《清漪楼诗稿》。

资中木偶戏

王志行

木偶戏是由演员操纵木偶进行表演的戏剧艺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个戏曲类别。

中国的木偶戏历史十分悠久。据《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记载：“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又《史记·殷本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可见在殷、周时代就有木偶制作。不过，那时是用来作为“神”或陪葬的物品。以后逐渐有人用来表演，于是开始出现了木偶戏。传说它渊源于汉代，到三国时，马钧所制木偶能表演各种技艺，木偶戏初具规模。但那时称为傀儡戏，或称傀儡子、魁儡子、窟儡子。开始也只用于丧乐，汉末始用之嘉会，北齐后主高纬更善爱之。到唐代大历年间，有人“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见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宋代更发展为“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水傀儡”等，木偶戏大盛。以后元、明、清各代均甚流行。

近代，一般都称为木偶戏。根据木偶的体形和操纵技术的不同，分为“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四类，各有它的流行地区。

资中的木偶戏，是属于杖头木偶一类。清代就有戏班组织。据老艺人回忆，清末民初，活动在资中西乡一带的有高楼场的金泰班、万祥班，走马场的玉祥班、春林班；归德乡的江万银班。活动在东乡的有太平场莲花桥的陈银匠班。这些木偶戏班，除莲花桥陈银匠班是小木偶外，其余都是大木偶。

民国22年（公元1933年），从遂宁、安岳过来了一个小木偶戏班，名叫顺乐班，班主杨荣山、范绍华，在资中乡下演出。当时，资中群众因看够了大木偶的表演技术，对小木偶的表演感到新奇，觉得小木偶轻巧灵活，蹦跳自如，表演时易于发挥，演来逼真，不象大木偶笨重难舞，蹦跳十分吃力，因而，逐渐抛弃了大木偶而善爱小木偶。金泰班、玉祥班无法维持，只得散伙，最后，资中境内只剩下一个顺乐班。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国难深重，国民党当局却依然花天酒地，残酷剥削，人民经济生活一年不如一年。顺乐班唱了几年，再也混不下去，民国34年（1945年），班主杨荣山逼得把箱子卖给了高楼场的地主崔可定，由崔另组新班，直到解放。

解放前的木偶戏班，由于经济收入极不稳定，班子聚散无常，人员也经常流动。一般组成一个戏班要八个人。其中，负责表演，行名叫顶杆子的四人。这不能缺少，所以在班内又叫四柱。负责音乐打场面的四人。这可增可减，或者增一个琴师，或者锣鼓合为一人。艺人们称之为“七紧八松九逍遥。”演唱的戏文都是传统川剧，演出活动充满迷信色彩。唱戏的和看戏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神佛保佑，四季清泰，人畜平安，免除瘟疫疾病。因此，每月唱戏都有个名称：

正月叫“清醮戏”，意思是求得一年平安。

二月叫“观音戏”。

三、四月“秧苗戏”，祈求禾秧茁壮成长，不受病虫害灾害。

一般到五月端午以后要散班，停一、两个月再唱。不过，如有人包唱“愿戏”，即求神还愿戏，班子就可以不散。

七、八月间打谷子时，重行组班唱戏，叫“虫皇戏”，感谢虫皇，保证了丰收。

九月又叫“观音戏”，说是观音生日。

十月以后，又要散班，一直到第二年正月前再组新班（以上均系旧历）。

演唱地点大多找所谓“菩萨灵验”的地方，如资中县城附近的醴台山，玉河沟（公元1934年岩崩曾在这里挖出许多佛像，轰动一时，被认为是菩萨显灵）、报恩寺；球溪河的石宝山、太平场的莲花桥等地。当时，在这些地方，一般有群众自愿组织的所谓“清醮会”。会首由群众推选，一年一换。唱戏就由会首筹组，挨家挨户收钱，多少听便。人们为了求老天保佑，一年康泰，所以尽管家里很穷也要凑上几文。有钱出钱，无钱出粮，甚至随便凑些什么也行。这种由会首出面筹唱的戏，就叫做“会戏”。至于“愿戏”，只要有人出钱包唱，有无人观看无关紧要。即使场上空无一人也可以唱，因为这是演给菩萨看的。所以，那时的木偶戏只是艺人赖以职业糊口的工具，根本谈不上“艺术”两字。

除前面所说的职业戏班外，在县城西门口，有一个地主舵把子叫朱明远的，有一套锣鼓齐全，服装整齐的木偶衣箱。每逢过年过节，或有喜庆、高兴之事，就请人前来演唱，业余消遣。据说有次也曾到球溪镇演出，把一个职业川剧班子也赶跑了。

在旧社会，戏剧艺人被认为是“下九流”，地位十分卑贱。他们在统治阶级、达官贵人心目中，不过是个“玩具”，可以随便使唤，任意玩弄。唱得好或博得统治阶级、达官贵人高兴时，可多得几个赏赐，否则，不给分文，还要挨骂、受侮辱。古时优伶，侏儒就是被人“玩弄”的人。话剧《秦王李世民》中就有齐王元吉戏弄侏儒的表演。唐、宋时代，豪门贵族盛蓄家伎成风。这些家伎都擅长歌舞弹唱，但她们都可以被主人作为礼物送人或当作商品卖买，所以又称为“伶奴”。近代虽然好一些，但卑贱低下的地位基本没有改变。木偶艺人较之川剧（这是四川的主要地方戏剧种，故以下均用之代表戏剧）艺人地位还要低。川剧班子一般是跑“大码头”，比较富庶的地方，而木偶戏班只能在穷乡僻壤，主要靠“会戏”来维持。年成好，丰收，农民吃穿有剩余，班子可以敷衍过去。遇上荒年，农民自身难保，那有心来唱“会戏”，班子就不易维持。加上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不安，灾荒连年，民生凋弊，木偶艺人的遭遇就更惨。所以，班子时聚时散，常常今年这个当班主，明年就换了那个，后年又换一个，有时甚至上、下年就换。在散班时候，艺人们既无土地房屋，又不会其他手艺，只有去当端公、道士，混一口斋饭吃。一般年轻艺人蹦跳得力，容易参加组班；一旦年老力衰，不受欢迎，许多人就此沦为乞丐，最后病死他乡。木偶艺人之间流行着一句话：“路死路埋，沟死沟埋”，说明了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悲惨的一生。更为凄凉的是，许多艺人死后找不到地方埋尸。因为当时群众认为他们是唱戏的，埋在哪里会给那里带来不清静。老艺人秦云昌死后，先后挖了三个地方，当地人不准埋，最后只得偷偷地埋在庙后。许多艺人死后没有棺材，同班人如果乞讨不到火板板，就只有用席子裹尸。老艺人魏品就是这样被埋在浅土里，后被野狗拖出来分食，待人们发现，只剩下了些骨头。不少艺人由于生活无着，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廖彩霞、芦斌武死时都只有廿多岁。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说明：在旧社会，木偶艺人要想混口饭吃都很困难。他们终年奔波、劳累，而等待他们的却是贫困、屈辱、饥饿和疾病……。老一辈消逝了，新一代又接着走这条路。

春雷震，太阳升，雄鸡高唱天下晴。

从此艺人庆解放，千秋万载颂党恩。

解放后，1953年3月，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县文化馆的辅导和帮助，由川剧团的涂申之（原内江木偶艺人）、刘霭云、田文清、彭跃光等发起，联合资中原有的木偶艺人，成立了“资中县民间艺人木偶队”，这就是现在的“资中县木偶剧团”的前身。

木偶队成立后，刘霭云、田文清、彭跃光因工作需要，仍回川剧团工作。全队共14人（男12人，女2人），由涂申之任队长，李友生任副队长兼管财经。当时生活十分艰苦。演出用具——木偶衣箱是过去崔可定的，土改时被作为地主财产没收，丢在农会保管室里。他们把完整的和可以修补的捡出来，拼拼凑凑，又赊购了朱明远的一些衣箱，凑成了一副“烂行头”。没有围台，涂申之用自己的纱布蚊帐拿来改制，横联、吊联全用纸做。没有经费，到一个码头，常常是欠帐吃饭，演过戏有了收入再付还；税金付不出就打欠条。幸好的是，他们队伍小，人员少，票价较低，城市每张票大人700元，小孩500元，农村300元、200元（当时币制没有改革，700元相当于现在的7分，余类推）。农村缺乏文化生活，他们所到之处，很受欢迎，因此逐渐有些积余。但当时为了添制行头，大家仍然节衣缩食，只要能吃饱饭，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今许多老艺人提起当时的生活情况，就会想起那“三人合穿一条裤子，捡烟锅巴过瘾”的情景。

第二年，他们接受群众意见，因他们所从事的是戏剧工作，改名为“资中县百花木偶川剧队”。从这以后，由于艺人们的努力，收入逐渐增多，除提取公积金外还有剩余，逐步实行了工分制，除了吃饭，每人每月能得到二、三元的生活费。水烟则由队里发给。

1956年，县委文教科为加强对手偶艺术事业的领导，改组了队领导，派转业军官熊凯（党员）到队担任队长。成立队委会，原领导涂申之、李友生及队员韩志堂、吴本初四人为队委。当时许多艺人缺乏文化，熊凯也水平不高。几年以后，出现了经济混乱，账目不清的情况。县文教局又加派刘昌玖来团工作。这时，木偶队已改名为“资中县木偶剧团”（1964年又曾一度改名为“资中县农村木偶剧团”，1975年恢复为“资中县木偶剧团”，一直至今）。1963年，熊凯免职，改任刘昌玖为团长。在此期间，1962年政府又派一名全民所有制干部黄先敏到团担任美工。综计先后共派三人，除熊凯已于1964年病死外，刘昌玖和黄先敏两同志，在剧团以后的发展史上都作出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刘昌玖主持全团工作，在推动全面戏改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黄先敏在改革木偶造型艺术上作出了创造性的成绩。

在此期间，为弥补艺人死亡出现的演出力量薄弱的情况，又曾从川剧团先后调来胡青山、陈光伟、邱仕林等五人。这些人在剧团初期发展史上也起到了骨干作用。

剧团建立后，在1964年前，演出的大多是传统川剧，曾先后演出《白蛇传》、《柳荫记》、《反徐州》、《牛郎织女》、《闹天宫》、《营门斩子》、《大破天门阵》、《博望坡》、《红珠女》、《一顿饭》、《瓦岗寨》、《大舜耕田》、《安安送米》等剧；也曾演出过《严老汉入社》、《张二嫂学文化》和《解放台湾》等极少数现代戏；同时还曾演出过不少“条杠戏”，几个人临时一凑就演一本戏，质量很低，群众提出意见。剧团中许多同志感到这样下去是走“下坡路”，会影响生存。当时适逢全国文艺舞台正掀起一股演现代戏的热潮，演传统戏已出现“此路不通”的情况，于是，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大家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才行。但要改演现代戏，那就必须抛弃过去的传统程式，特别是在木偶造型艺术上，要改变过去木偶戏班简单地仅以“生、旦、净、末、丑”的木偶来笼统地

代替和表演各类剧目中的众多的人物形像，而必须按照剧本对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和要求来雕塑造型。这样才能演来逼真，动人情志，引起共鸣，而收到群众欢迎的效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遇到了困难。第一，许多老艺人文化低，要熟读和钻研一个现代剧本困难很大；第二，老艺人们习惯于过去老一套的表演方法，对新的表演方法格格不入。第三，缺乏资料。面对这个情况，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着困难上，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首先派出黄先敏去成都和上海木偶剧团学习造型艺术；派出青年演员张反修、刘英去重庆木偶剧团学习儿童节目。回来以后，全团动手，刻苦学习和钻研，边学边演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不但制作出了一批符合现代戏要求的木偶头像，而且创造出了国内具有独创风格的“木偶装置结构”。以前演木偶戏，一个木偶都是“三根木棒一个头子，外加一件衣服”的装置结构，用三根木棒代替了两段和下身。改革后的木偶，有头部、上胸、下腹、两手、两腿足的结构组成，能体现人的全身。这些木偶不但“嘴”、“眼”、“鼻”、“眉”和“头颈”都能表演动作，两手能自由活动，而且两足能走路、能踢腿，还能扭腰（当时全国木偶剧团都不能表演两足走路的动作，男女老少下身都是裙子围身，只有资中一家穿的是裤子）。这样吸引了群众，赢得了好评。资中木偶剧团在濒临绝境中站了起来。

除此之外，当时他们创作的“泡沫着色法”代替“画笔着色法”，由于方法简单方便，着色均匀利索，节省时间，后来引起了上海市木偶剧团美工的兴趣，并为国内许多木偶剧团所采用。

在成绩面前，他们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再接再厉，继续前进。自1968年到1972年，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彻底地全面地戏改工作。1968年，他们在《文汇报》上看到利用录音演唱《英雄小八路》的报导后，感到这是个提高演出质量的好办法。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派性斗争十分严重。但他们迅速排除了派性的干扰，争取到县委革政工组的重视，请调来县美术界的曾廷仲、何昭恕、孙文光三位同志，同本团美工去长沙、上海、北京、西安等地观摩学习，以求进一步改革和美化木偶造型艺术；另一方面又派出演员去长沙、湖南省木偶剧团学习；同时又参考了电影《木偶小歌舞》的表演和制作技巧在木偶造型、服装设计、灯光布景、台幕装置和音乐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改造。这就完全摆脱了旧木偶戏的一套表演艺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获得了赞赏。剧团曾先后到重庆和成都等大城市演出，连演四、五个月，场场客满，轰动了山城、锦都。1973年4月21日，《四川日报》第三版刊登一组照片，介绍资中木偶剧团情况，标题是《令人喜爱的新木偶戏》，内容有：①刻苦钻研，努力提高，演员们正在排练《洗衣歌》；②歌舞《我爱北京天安门》；③剧团自己编创的小歌剧《半夜鸡叫》；④剧团职工克服重重困难，自己精心制作现代木偶。省人民广播电台也以《扁担剧团气象新》为题作详细介绍。省文化局还专门召集省直属文艺团体的管理干部座谈他们的改革经验，并曾多次在省、地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作介绍，名闻全川。省内一些木偶剧团纷纷前来资中学习取经。

1975年，由于他们在戏剧改革中有所创新，省文化局选中了他们的《红小兵学雷锋》、《四川狮子舞》、《深山问苦》三个节目，出席参加“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调演”。在北京，他们的演出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欢迎，引起了全国木偶、皮影艺术界的重视，并发表评论，祝贺演出成功。辽宁省锦州市郊区木偶剧团评论说：“演出精神很好，操纵熟练整齐，表演认真，配合协调，人物刻画细致，尤其是《红小兵学雷锋》中的小妹妹表演、配声都很形象、逼真，收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北京外文印刷厂工农兵文艺评论组也说：“《红小兵学雷锋》很有儿童特色，给人印象很深，对培养儿童从小就爱国家、爱集体、爱劳动的优秀

品德很有教育意义。”这次调演使艺人们受到很大鼓舞，特别是老艺人。过去，他们总觉得木偶戏在四川被称为“秧苗戏”、“担担班”，“低人一等”，不能上“大雅之堂”，现在竟登上了首都的大舞台演出，真扬眉吐气，增强了事业心，从而，为第三次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后，砸烂了“四人帮”强加于文艺事业的种种精神枷锁，给戏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1977年开始，剧团又进行了第三次改革。他们总结了前两次改革的经验，认识到第一次改革主要是题材的改变决定了木偶造型必须与之相适应，但毕竟是初次尝试，艺术质量比较粗糙。第二次改革，木偶造型虽较前一次有进步，是“漂亮”了，“美化”了，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受“样板戏”的影响，题材不免单一，木偶造型片面追求“真实”，妨碍了多样化的发展。如今，束缚已经解除，“百花齐放”的方针已经得到正确的贯彻，木偶戏的题材越来越广泛，演出形式也多种多样，这就要求木偶造型也必须多样化。于是，在改革中，他们注意了不同题材、不同内容的戏的不同的风格，注意了木偶造型特有的“偶”味，从上一次追求木偶头像外表的华丽漂亮变为展示木偶的“内在美”，一句话也就是注意木偶的艺术质量，它的工艺价值。对每个戏则注意它的总体设计，吸收国内兄弟剧团的长处，学习“提线木偶”、“铁线木偶”的表演技巧，与自己的“杖头木偶”的表演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套木偶特技表演艺术。在表演时，木偶可以脱离杖头的操纵，腾云驾雾，空中飞跳。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中，当悟空在追打白骨精时，两个木偶不但可以在空中腾飞，翻跳斗殴，甚至可以破除舞台表演的框框，在观众头顶上飞过，这使观众得到了惊奇的感受，赞誉纷纷。即使在一个仅有三、四万人口的小县城，连演四、五十天，盛况不衰。

在木偶造型艺术上，由于美工人员刻苦钻研，不断改进，1979年，他们吸收民间工艺美术特色而创作的木偶造型，参加“四川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览”，获一等奖。同年六月，《四川画报》刊登了他们的获奖作品《孙悟空》和《铁扇公主》木偶造型两幅照片。翌年三月，《戏剧与电影》载文介绍资中木偶剧团的木偶造型。1982年，他们又设计创作了《白蛇传》全套木偶造型，被选送北京参加“全国舞台美术展览”，引起舞台美术界的重视。目前，他们正继续努力，虚心探索，深入琢磨，决心要为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群众喜爱的木偶形象而贡献力量。

三十多年来，资中县木偶剧团由于不断改革，精益求精，蜚声于全国木偶、皮影艺术界，为中国人民所喜爱，所到之处，群众踊跃购票，收入不断增加。曾经出现过一个月连演58场，收入达14000元的高潮。1981年第二次去北京参加“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调演”时，文化部、中国剧协统计各个剧团的经济收入，资中木偶剧团的人平产值居全国各木偶、皮影剧团之冠，为全国受表扬的四个剧团之一。进入七十年代，许多兄弟县木偶剧团因各类戏剧团体的竞争和受电影，特别是电视发展的冲击，无法维持，纷纷撤销、解散。而资中木偶剧团的路子却越走越宽广，演出形式愈来愈多样，除川剧外，还有京剧、歌剧、歌舞、杂技，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成为全省保留的四个木偶剧团之一（注）。

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多，艺人生活不断提高，过去，那可诅咒的年代，聚聚散散，唱了上本不知下本，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的悲惨境遇已经进入了博物馆，成为历史的陈迹。如今剧团自给有余，艺人生活安定，吃穿不愁。1982年底，全团22户，就拥有电视机7部，洗衣机3台。1974年，剧团就拿出资金八万多元，在现交通路（原荷花池）修建了一座有20个套间、10个单间，包括有排练场、保管室，建筑面积达一千四百多平方米的五层楼房，永远结

束了过去“行李随身带，舞台是住房”的无家无室的情况。老艺人李有生满怀激情地说：“在旧社会，象这样的楼房我连门都不敢跨进去，那象现在，可以大摇大摆，随便踱进踱出，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三十多年来，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他们能有今天，除了本身努力，不断改革外，党的关怀，政府的大力扶持，艺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因素。建团以来，政府除加派干部外，还在艺人中进行了建党建团，现有党员1人（张反修，资中县文工、木偶党支部副书记）。1963年底，木偶剧团就建立了团支部，先后有10名青年参加了团组织。老艺人涂申之、李志成（已故）和刘昌玖先后被聘任为政协委员。这些，使艺人们感到心情舒畅，劳动积极性获得了充分发挥。

三十多年来，他们还认真贯彻执行了三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服务方向。这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五十、六十年代，不管是烈日熏蒸，或是风雪迷漫，他们总是每人肩挑一副担，跋涉奔波在农村场镇、村寨之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一天要移二、三个地点。涪陵山乡，巫山险道，荣、键林区，云、贵高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就锻炼和培养了他们在艰苦面前不动摇、不退缩的思想意志，为不断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在，他们虽然人多了，但仍坚持小型、灵活、多样的原则，坚持“乌兰牧骑”的方式，分成两个演出队，每个队仅十一、二人，奔波在西南地区，为广大群众演出。他们还根据木偶适合儿童玩赏的特点，经常送戏到幼儿园和学校，为培育祖国的花朵洒下了汗水。

三十多年来，他们还注意了培养新生力量。从1956年开始，他们就采取两个办法招收新生：一是发现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个别吸收；二是公开招生。前后共招收了30人。除随团培训外，还选择少数拔尖的送往成都市和重庆市木偶剧团进修。随着年代的消逝，许多青少年都已成长为剧团的骨干。女演员丁常清是最先招收入团的一个。她唱腔和操纵表演俱佳，是剧团的导演，又是学员的教师，已经培训了四批学员，曾一度被推为全国木偶皮影学会的理事候选人，现已调成都市木偶剧团工作。美工李明栋，是1972年参加工作的青年美术人才。被选参加“全国舞台美术作品展览”的《白蛇传》木偶造型就是他设计创作的。他现在是剧协四川分会会员，省舞台美术学会理事。剧协会员，现任团长张反修、副团长史伯玉、吴祥明和业务骨干赵会武、余定友、刘忠华等也都是五十年代末和六、七十年代相继招收的新生。由于后继有人，活力不衰，剧团充满了生机。

1984年，为照顾老弱艺人和安排演员家属，剧团举办了第二职业，成立了一个录像放映队；又投资六千多元，与日杂公司联营开设了“资中县日杂工业品联合经营部”，经营工业百货。另外还在汽车站旁设立了“小件物品寄存部”，以便利往来旅客。这样，做到了家属、空闲人员全部就业，从而使全团上下更加团结一致，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注：全省保留的四个木偶剧团是：成都市木偶剧团、重庆市木偶剧团、仪陇县木偶剧团、资中县木偶剧团。

资中县发现的宋代铁币窖藏

胡清友

钱币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历代以来，对古钱币仅停留在古钱商的地位或属于古玩之一，因此人们又称之为“玩古钱”。新中国成立后，才对古钱币进行科学研究。通过古钱研究，可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并进一步了解祖国光辉的历史。

历年以来，从我国各地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古钱中，以宋钱为最多，而在宋钱中，北宋又多于南宋。这是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货币流通量大，加之年号更改得很勤，随着年号的更改，就要以新的年号命名铸钱，所以宋代的钱币数量多，品种多，钱币的名称特别复杂。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这说明宋钱的质地有铜、铁和夹锡钱。而铁钱已成了正规制度公开大量发展。北宋钱币地方性突出，川陕两路用铁钱，长江下游一带用铜钱。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今名山县百丈场）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故四川专用铁钱。

从四川省资中县窖藏出土的宋代铁钱足可证实，两宋钱币大小等第多，作价不一，种类繁多，书体多样，同径钱币重量不等。

1984年12月，资中县允溪乡鹤林村三组社员在责任地里挖土取石，发现一窖藏，报告了县文物管理所。文管所派出文物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调查，得知此窖藏距地表约40厘米深。出土的铁钱是由两个直径56厘米，腹高22厘米的铁釜盛着，共出土铁币72斤。与铁币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直径15厘米宽的铜锣，四个宋代粉青瓷碗，两个瓷盘。窖藏内大部分铁钱已锈蚀成铁饼。经过我所技术人员用煮沸，煤油、醋浸泡，洗刷，挑剔，整理后，铁钱字迹尚能清楚辨认的有三百多枚，约二百多个品种。19个年号钱均为两宋铁钱，无一枚铜钱。铁钱计有：（按铸造年代顺序列后）“祥符元宝”，草书；“天禧通宝”，仿宋；“熙宁通宝”，楷书；“元丰通宝”，草书；“元祐通宝”，草书；“绍圣元宝”，草、篆书；“元符通宝”，篆书；“崇宁通宝”，仿宋；“崇宁重宝”，隶书；“大观通宝”，瘦金书；“圣宋元宝”，草、篆书；“政和通宝”，隶、篆书；“宣和通宝”，楷书、篆书；“绍兴通宝”，仿宋、楷书；“隆兴元宝”，仿宋；“乾道元宝”，仿宋、楷、隶书；“淳熙元宝”，仿宋、楷书；“淳熙通宝”，仿宋；“绍熙元宝”，仿宋、楷、篆书；“绍熙通宝”，楷书；“庆元元宝”，仿宋、楷书；“庆元通宝”，仿宋、楷书；“嘉泰元宝”，仿宋、楷书；“嘉泰通宝”，楷书；“嘉泰之宝”，楷书；“开禧元宝”，仿宋、楷书；“嘉定元宝”，仿宋、篆书、楷书；“嘉定通宝”，仿宋、楷书；“嘉定正宝”，仿宋；“嘉定之宝”，仿宋；“嘉定永宝”，仿宋；“嘉定安宝”，仿宋；“嘉定全宝”，仿宋；“嘉定真宝”，仿宋。

据史料记载：“窖藏出土的北宋铁钱，幕上均是光幕”。从资中窖藏出土北宋铁钱证实大部分为光幕，而仅有一枚“宣和通宝”的幕穿上有“陕”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在研究宋

代铁币史上是一个突破。南宋铁钱篆文较复杂，有记铸地或钱监的如：“邛”、“川”、“同”、“春”、“汉”、“陕”等。有记值的如：“三”（或作 ㄩ ）、“二”（或作 ㄩ ）等。有记钱范放置位置的如：“正五”、“二四”、“二五”等。有记铸年的如：“元”、“二”、“三”、“四”、“五”……“十”等。

此次窖藏铁钱出土是我县第一次发现。从铁钱种类看，最早的是“祥符元宝”，距今已969年；最晚的是“嘉定元、通、正、之、永、安、全、真宝”，距今已761年；整个铁钱中并无嘉定年以后铁钱，由此可以证实此窖藏是南宋嘉定年间窖于地下的。钱币大小等第多，作价不一，有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大铁钱；钱文种类繁多；书体多样。这说明了两宋钱币在我国钱币史上最多、最复杂。钱币品类多、货币流通量大，证实了两宋时代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国家稳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由于生产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小发展，货币大量流通，为适应大量商品的交换，而导致这个时代大量铸钱。铸钱得越多，铸造工艺就越窳劣，品类越多，重量也就不等，说明当时币制之紊乱。这次宋代钱币窖藏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宋代钱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附拓片）

资中县佛教概况

释清德

一、我所知道的佛教和资中县佛教的概况

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它作为一种宗教，从汉代流传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中经历了各个封建王朝，代有消涨，但和儒、道两教造成鼎足而三，平分秋色的形势，则是无可否认的。谈及佛教二字的含义，广义地说，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生活，以及教会组织等；狭义地说，是佛所说的言教，又叫做佛法。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信仰它的人，在印度境内，日益增加。嗣以东西往来，畅通无阻，文化交流，愈见频繁起来，故有不少印度高僧东来我国说法传教，我国也有不少高僧西去印度取经求法，因此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研究和传播，都有长足的进展，以此形成了繁多的佛教宗派。其中最主要的，大概分为大乘八宗——净土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律宗、慈恩宗，小乘二宗——成实宗、俱舍宗，合称十宗。凡是信仰佛教的僧俗四众，统称为佛教徒。其中包括在入教时举行过皈依仪式，正式披剃受戒的，男的称为比丘（和尚），女的称为比丘尼（尼姑）；未受大戒者，男的称为优婆塞（大居士），女的称为优婆夷（女居士）。清代末年，全国各地共有正式僧尼约在800万人左右。民国成立后，估计人数也不会有多大的出入。至于资中全县佛教徒的人数，向无正确的统计。据1952年12月29日临时办公室统计，我县僧尼原有230余人，现有120余人。出家居士（住在寺庙未举行出家仪式的）原有200余人，现有50余人；在家居士原有600余人，现有300余人。再有，专以念经忏做法道场谋

生的有200余人。有名的如王爷庙以觉盛为首的肉食坛，万寿宫以万成为首的素食坛，香火均极旺盛。其他各乡镇，还有不少大、小不等的分坛。当时全县较为著名的寺庙，约有60多所。我记得的寺庙和住持，有永庆寺莲映、宁国寺昌绪、甘露寺圆灿、罗汉洞妙禅、高山观能定、圣水寺佛静、东皋寺法宾、大慈寺达文、广太庵法智、法王寺莲昆、心禅寺新仁、清凉寺泉仙、化城寺觉云、上观音法仙、西禅寺登园、金峰寺妙法、盘龙寺宏信，传灯寺宽舫、碓盘寺空相、楠木寺宏福……。这些寺庙，分布在全县各乡镇中，其间除宁国寺、喻家寺、甘露寺几处有较多的田土，僧众可借收租谷以维持生活外，其他绝大部份的寺庙都只有很少的田土，僧尼亦多赖自耕维持生活。资中僧尼的宗派，如禅宗，已流于形式，人数不多。香火最盛的，首推净土宗，各处都设有念佛堂。其次是密宗，在1947年，修持密宗的能海法师，曾应县人林云根、陈阜南、廖哲明等的请求，来资讲经传教。当时能海法师驻锡重龙山的永庆寺内，每日听众几上千人；随从僧众，达二十余人，传授三皈五戒，先后亦达数百人。其次就是自贡市天台宗佛生法师，也曾多次来资，在罗汉洞老君庙讲经宏法。此人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传授念佛法门，对我县当时的佛教徒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解放后，能海法师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及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对佛教事业及祖国建设作出了不少的贡献。解放前，我县研究佛学的知名人士，有邓佛向、田公甫等。其他如寒山和尚擅长左手书法，肖佛意居士所绘佛像，亦名噪一时。解放前，资中设立有佛教分会，由寂楷任理事长，于1951年3月被镇压。从1952年到现在，还存在的佛教徒，和尚中仅有达文、宽舫和我等数人；尼众有能智、法智、能清等数人；居士有4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上明文规定，凡属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只要从事正当的宗教活动，是受到党和政府的允许和保护的。1953年，中央正式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以喜饶嘉措为会长，开展正常的佛教活动。后来又成立了中国佛学院，以赵朴初居士为院长，作为钻研佛法及培育人才的专门机构。我想，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今后的佛教一定会欣欣向荣、发扬光大。全国的佛教徒，都是爱国阵线的成员，就更应该本着利人济世、慈悲为本的精神，积极投入四个现代化的行列当中去，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吧！

二、我参加佛教的简历

我俗名刘任民，男，资中县归德区人，现年60岁。我青幼年时代，因家境清贫，生活困难，又因受伪政府估拉壮丁的逼迫，故远逃在外，于21岁时出家于彭县九峰山莲池寺，拜澄澈上人为师，皈依佛法。先学习唯识宗，于1946年在成都昭觉寺正式受戒，法名清德，号竹山。1948年，又转迁到自贡妙观佛学院，学习天台宗。1953年回到资中重龙山永庆寺住持。1956年，由资中县人民政府保送入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深造。毕业后仍回永庆寺，行持净土宗，虔修四摄六度法。从1974年起，我在重龙山协助管理文物，种植花木，经营修建等工作，不辞艰苦，兢兢业业，同时承担起一个和尚应做的事务，持戒虔修，利乐有情，愿为佛教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资中县水利电力建设之“最”（一）

李 丹

（一）最早建成的山垮塘——君子山垮塘

君子山垮塘位于县城北郊君子泉风景区附近，因此得名。1954年秋，利用农闲发动群众在夹沟锁口处筑土坝，坝高6米，蓄水量2万立方米，集雨面0.2平方公里。自流灌溉，全社受益。

君子山垮塘的建成，为平塘转为山垮塘的水利建设开创了先例，并为发展两季田提供了充沛水源，曾多次受到省、地、县表彰，并全面推广。

（二）最大的水库——龙江水库

龙江水库位于龙江区新政乡。1972年施工，几经曲折，延至1981年冬建成。石质拱坝高18米，长235米，集雨面64.6平方公里，总库容2520万立方米，有效库容1890万立方米，平均水深9米，控灌龙江区7个乡的耕地十余万亩。配套工程已建成主干渠6条，总长41公里，隧洞19处，总长2335米，渡槽9座，总长966米，分水闸23处，电站3处；还建有水电站1处，装机容量100瓩。库中孤岛上作人工繁殖鱼苗基地，为15.2平方公里水面提供鱼源。现已作农、林、牧、副、渔挖潜综合规划，龙江水库面貌正日日新，又日新。

（三）最早建成的中型水库——黄板桥水库

黄板桥水库位于球溪河上游，资阳县黄板乡境内。经两县协议，由资中县主修，两县共同组成灌区代表大会作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管理所为常设机构，由资中县调派人员。1960年8月施工，1963年完成大坝枢纽工程，1972年完成左右干支渠58条186公里。水库占地2400亩，集雨面30.2平方公里，均匀土质坝高25米，库容1451万立方米，控灌资中、资阳两县三个区八个乡的耕地5.4万亩。1964年利用水面建立渔场。1970年渔场作人工繁殖试验，逐年积累经验，成功率达90%。鱼苗供应各社（乡）队（村），对渔业发展有一定贡献。水库管理所在库区周围、渠道两旁植树造林，现已成荫，展现一幅优美图画，参观者络绎不绝，如在画中行。

（四）最早建成的小（一）型水库——石板河水库

石板河水库位于球溪区走马乡附近。1957年施工，1958年竣工，是全县最早建成的小（一）型水库，也是第一座国营水库。1981年下放给球溪区管理。

水库均匀土质坝高23米，蓄水478万立方米，干渠长21公里，支渠18条总长32.7公里，

控灌球溪、鱼溪两个区四个乡耕地9880亩（其中提灌617亩）。1964年利用水面建立国营渔场，1967年试验人工繁殖鱼苗，已成为“两种生产，两项收入”基地之一。

（五）最早建成的小（二）型水库——泉水沟水库

泉水沟水库位于公民区三块石乡。1955年施工，1956年竣工。建成均匀土质坝高10米，蓄水25万立方米，干渠2条长3.5公里，支渠1条长3.5公里，灌溉本乡耕地1000亩。此库是全县最早建成的小（二）型水库。由乡集资主修，国家补助建成。在建库期间，县人民委员会曾在工地举办水库施工人员进行训练班。现已利用水面养鱼，发展渔业，增加收入。

（六）最高的土坝水库——东风水库

东风水库位于球溪乡偏岩子附近，故又名偏岩子水库。由当地区、乡“土专家”设计，1958年10月施工，1959年4月竣工，均匀土质坝高30米，为全县最高土坝。蓄水212万立方米，可灌4个村39个组的耕地1700亩。主体工程共投资64.79万元（国家投资51.19万元）；配套工程建成渠道9条，总长11.92公里，隧洞6处，总长783米，渡槽7处，总长699米。总投资70.4万元（国家投资24万元）。

（七）最高的石坝水库——大河沟水库

大河沟水库位于新桥区白庙乡，由兴隆乡修建、管理。1970年1月施工，1975年完成石质拱坝高27米，是全县最高的石坝工程。总蓄水量354万立方米，控灌兴隆、板栗两乡12个村80个组的耕地，计自流灌溉6925亩，机电提灌1565亩。已建成干支石渠4条，总长32.5公里，实现石渠化；渡槽5处，总长258米；隧洞1处，长140米；改建公路8.5公里。建成后，属灌溉效益较好的水库之一。

（八）最早建成的新型坝——瓦店子水库

瓦店子水库位于资中、威远两县交界处的瓦店子附近，因此得名。距资中县城约30公里，由金李井、豹岭两乡共建共管。由于当地土质不宜筑坝，但有丰富的石料资源，经四川省水电勘测设计院派员协同资中县水利电力局设计“浆砌条石防渗斜墙干砌条石坝”的新型坝。1970年11月施工，1981年完成枢纽工程。坝高48.2米，长143米，库容335万立方米，控灌金李井、豹岭两乡的11个村93个组耕地1.58万亩。工程总投资216.44万元（国家投资185.29万元）。此种新型坝不仅在县境内属首创，在省内亦属最早，为水利建设积累了资料。

（九）最高的石拱渡槽——发轮渡槽

发轮渡槽位于县城西北62公里的发轮场口，因此得名。它是黄板桥水库右干渠横跨发轮河（球溪河上游）、接通天灯山与马儿山的大型水利配套建筑。墩高55米，槽长252米，净空宽2.8米，深1.4米，流水断面2.8米，深1.2米。引灌资中、资阳两县耕地2.5万亩。

发轮渡槽工程由四川省交通设计院、温江公路养护总段工程队、资中县水利电力局共同设计施工。全槽用 π 型四大孔，每孔跨度60米；主拱圈上空腹横墙，小拱侧墙，每孔上有空

腹半圆小拱8个(跨径3米、4米各2对);墩顶横挖空作小拱;槽身为钢筋混凝土π型拱圈结构,槽底板,边墙均用条石砌筑。1971年5月施工,1972年9月竣工。总投资455万元、依靠集体力量自筹350万元,国家投资105万元。此项工程为资中、资阳两县农田提供了保收条件,而且为发轮场增添了壮丽景色。先后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组织参观团参观,莫不叹为观止。

(十) 综合经营收入最高的水库管理站——公民水库群管理站

公民水库群在公民区,由回龙桥、桂家桥、二郎庙三座水库组成。原属县管的国营水库,1965年8月下放区管。下放时,仅有固定资产、流动资金5000元,下放后属独立核算单位。

管理站职工群策群力,发展综合经营。现已拥有各种类型房屋3000多平方米,经营发电变电、加工、自来水、招待所、渔场等业务;职工由8人增至25人。1966年至1983年收入达60万元,1984年收入9.5万元,是全县综合经营收入最高的水库。收入除职工工资、福利外,积累部分先后修建石渠40公里,占总渠道的97%、改建、扩建房屋2520平方米,购置柴油机和加工机具一套,以及招待所必需的设备。

公民水库群管理站的综合经营,鼓舞了职工,减轻了国家负担,并为全县水库走出了新道路。

宁国寺

王志行

出资中县城北门行十里许,有一小山,名曰栖神(现属谷田乡宁国村)。山上树木葱茏,山下溪涧环绕,小桥流水,景色宜人。宁国寺就座落在这小山上。它始建于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明天顺七年(1463年)重修,以后明万历和清乾、嘉年间又多次修葺。寺依山而建,前后殿堂共五进,两侧僧房数十间,殿宇巍峨,建筑宏伟。《资州志》云:“为县中著名各寺之冠。”可见是资中又一胜地。

考宁国寺与新都宝光寺、峨嵋山金顶普光殿均创建于东汉,距佛教传入中国不到两百年,较之成都文殊院(创建于南朝)、重庆缙云寺(创建于南朝宋)、峨嵋山万年寺(创建于晋)都要早一、二百年,是四川省最古老的寺庙之一。这说明当时资中文化已相当发达,不然佛教是不可能如此迅速传入而建成巨寺的。据南宋地理志《舆地纪胜》记载,宁国寺在唐、宋时代香火鼎盛,驰名全国。武则天曾宣召主持智诜与弟子令柔去长安讲法,赐号智诜为“国大禅师”,赐名宁国寺为“菩提道场”。宋太宗也曾御书“芝草”匾赐挂寺内。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宁国寺在当时曾是全国著名寺庙之一。

关于智诜和尚和他的弟子令柔,《舆地纪胜》中还记载有他们的一些传说。据说,智诜俗家姓周,本是资阳人氏。唐高祖武德初年,他的母亲车氏一天晚上在林中吞下了一粒金